

#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实践路径与研究进展

孙庆忠 关瑶

[摘要]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文章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为线索,梳理了保护试点的推动进程与研究进展,并在全球农业文明的相互观照中,重申了传统农业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对反思高科技农业的危机而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世界各民族传统农耕智慧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哲学考量,其深层的价值则是对现代化知识系统的超越,是对“后现代农业”思想的启蒙。

[关键词]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传统农业系统; 农业知识; 乡村发展

## 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价值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保护项目,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大型的国际计划,其目的是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和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按照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sup>[1]</sup>。截至2011年底,FAO已在全球11个国家评选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16个传统农业系统作为保护试点。

FAO曾指出,农业文化遗产对于应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问题包括食品安全与贫困缓解、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补偿、文化多样性保护等5个方面。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而言,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文化多样性是两个重要方面,而传统农业地区是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连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桥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在做好两个“保护”前提下,促进地区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持<sup>[2]</sup>。基于这种认识,学者们一方面确定GIAHS保护试点并在该地区进行保护探索和经验推广;另一方面开展系列的科学研究:回顾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兴起的历史背景和各阶段的主要特征<sup>[3]</sup>,总结以GIAHS保护试点为标识的新时期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进展<sup>[4]</sup>,进而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探讨什么是农业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以及怎样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等基本理论问题<sup>[5]</sup>。

## 二、全球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实践

2005年,我国开始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

[收稿日期] 2012-07-19

[作者简介] 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083;

关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2009级本科生。

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在李文华院士的带领下,积极地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FAO在中国的试点保护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突出的成就在于:其一,利用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基金、农业部国际合作交流基金等,成功完成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和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等4个保护试点的申报,并在保护地进行了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探索;其二,围绕传统农业地区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基础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先后组织出版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丛书》12卷,组织召开“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论坛”14次,并通过《农业遗产的启示》等系列专题片和“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成果展”,全面地展现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

### (一)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进展

2005年6月,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正式列为首批GIAHS保护试点之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也以鲜活的形态为公众所认知。地处瓯江中下游、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的青田县,有1200多年稻田养鱼的历史。作为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渔耕文化,稻鱼共生系统通过“鱼食昆虫杂草—鱼粪肥田”的方式,维持系统自身的循环,从而减少了系统对外部化学物质的依赖,增加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

2010年6月被列入保护试点的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因“森林—村庄—梯田—水系”四素同构而堪称世界山地生态农业的典范。在这个拥有1300余年文字记载的立体农业系统中,丰富的传统稻谷品种、梯田中的水生动物、森林中的山珍野味,展现了这里生物多样性的特质;水资源系统的保护与管理、土地的高效利用以及围绕着农耕活动所进行的节日庆典,正是传统农业固有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思想的呈现。

与哈尼梯田同时被列入保护试点的是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位于鄱阳湖东南岸的江西万年县是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里的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是距今约12000年的稻作遗存。作为原始的栽培稻,万年贡米蕴藏着丰富的抗病虫、抗逆境的抗性基因,其耐瘠性比其他栽培稻中不多见的。除了具有生物种质资源的价值之外,这里传统贡谷的生产技术以及与水稻耕作实践并生的生活习俗,共同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万年稻作文化。

与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同宗的是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它于2011年6月被列入保护试点。在这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农业系统中,不仅有水稻、鱼、鸭三种生物,还包含螺、蚌、泥鳅和茭白等动植物。这种农田生物多样性的系统格局对控制病虫害、调节甲烷气体排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作为一种传统的农耕方式,它是当地农民在适应自然条件下形成的立体农业生产模式,“一田多用”在缓解人地矛盾的同时,也为民众生活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物质。

此外,已经被FAO列为GIAHS保护候选点的云南普洱茶农业系统和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以及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系统、陕西佳县传统枣园系统、浙江绍兴古香榧群落系统、新疆吐鲁番坎儿井水利工程系统、江苏兴化垛田农业生态系统,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农业文化遗产,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

### (二)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议题

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的申报工作同步,多学科视野下理论研究的跟进,使各遗产地成为了科学研究的平台。由于文化遗产地多具有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民族文化丰富等特点,农业的多功能特征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保持生物多样性、发展生态农业、维护乡村风貌、传承乡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点,学者们围绕着“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产品开发与管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旅游发展”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文化发展”等

主题进行了广泛研讨,并取得了基本共识。

第一,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环境价值。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中国农业污染已经超过工业和生活污染,成为污染水资源的最大来源。工业化农业已经将长期创造正外部效应的农业,改造成为制造严重负外部性的产业。面对这种深层的危机,学者们通过对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自然力代替人力投入、节约资源等思想的回归,反思了近50年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高偿付成本和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通过古代农书、通过日本对我国传统农业科技的重视和西方对自身石油农业的反思,强调传统农业科技的重要价值并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为解决中国的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sup>[6-8]</sup>。以稻鱼共生模式为例,虽然稻田养鱼的“单位投资回报率较低,不利于刺激农户行为”,但其直接经济收入和综合社会效益都比常规农业生产要高,而且有更高的社会效益,因此要用生态价值观而非简单的经济效益来评判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sup>[9]</sup>。那么,如何测度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环境价值?学者的定量研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其一是根据生态足迹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探讨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地区生产模式对于低承载力的环境的适应,证明虽然试点地的环境承载力偏低,但传统耕种方式的资源低消耗,维持了该地区的生态平衡状态,对区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sup>[10-11]</sup>;其二是通过对研究地区进行生态服务价值的计算,将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地区的生态功能量化,通过数字的比较,说明虽然稻鱼共生系统在投入产出比上低于常规稻作系统,不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却有着更高的社会-经济-生态综合效益,这些研究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和实现不同农业系统间的对比提供了依据<sup>[12-13]</sup>;其三是通过试验田的土壤、系统能值、微生物数量、杂草群落、生长性状等指标,证明遗产地在某一生态指标上的优越性,以此凸显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生态价值<sup>[14-16]</sup>。

第二,遗产地的社会文化价值与农业特性。在评估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学者也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印证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价值。通过对黔东南林木资源的历史追溯,他们发现该地区传承良好的少数民族宗教崇拜、习俗禁忌、乡规民约以及林粮套种的生产结构,对森林资源的保护起到了其他任何法律规范、制度措施所不能比拟的积极作用<sup>[17-19]</sup>。这种基于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视角,是对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活态保护和整体保护的重要维度,是研究其生态价值的基本前提。正如人类学家所言“我们不可能理解并保护生物多样性,除非首先理解造就、维持并管理着生物多样性的文化与社会,其语言、知识和技能提供了工具、构成了基本框架的文化与社会。唯有整体论、跨学科的思路能让我们理解这样的互动,让我们的行动产生效果。”<sup>[20]</sup>

通过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农业所负载的功能被重新认识。从农业功能的变迁角度视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农业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越来越少,但其承担的功能却越来越多。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的多功能性主要体现在产品生产、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保护和景观保留等5个方面。通过建立农业多功能性多维评价模型,不但能直观反映出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的主导功能,而且对其综合情况的定量描述还可以进行遗产地之间的对比,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筛选提供参考指标<sup>[21-23]</sup>。

第三,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旅游开发。GIAHS项目是为了对受到威胁的全球重要的传统农业文化与技术遗产进行保护,以期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保护系统。基于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保护的实践,闵庆文等认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建立多方参与机制,并提出应用参与式的方法对保护区进行管理的规划设想<sup>[24]</sup>。然而,农业与乡村在市场经济中的处境,导致了人口的流失和农民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摒弃。如何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的支点?如何化解地方性知识与现代化知识系统的冲突?如何让农民不离开土地又能过上富裕和有尊严的生活?围绕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这一急切问题,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发展旅游是促进遗产地保护的有效途径”。袁俊等以青田稻鱼共生为例,指出生态旅游是打开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与

发展困境的钥匙,并分析了生态旅游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和遗产保护产生双重作用的机制<sup>[25]</sup>。孙业红等则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聚落属性、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等方面,全面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价值,设计出3种旅游开发模式,并强调了环境因素、农民的参与以及监督监管的重要性<sup>[26]</sup>。除了通过旅游业获得地方经济发展之外,学者们也探讨了通过农业生产提升遗产地经济价值的方法。郑召霞等认为,有机农业是现代农业中能与传统农业的生产特点很好契合的农业类型,在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有机农业可以兼顾遗产保护和农民经济利益,是农业遗产保护的必然选择<sup>[27]</sup>。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生态价值位列其先,否则其他价值也就没有了根基。惟其如此,遗产地才能真正成为展示传统农业成就的窗口,成为农业文化旅游的目的地。

### 三、全球农业文明之间的对话

人类农业文明有着多个源头,中国只是世界农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人类传承下来的传统农业类型多样,分布在世界各地。牧场农业分布在巴西到阿根廷的南美高原、新西兰与澳大利亚的牧场以及南非高原的牧场;种植业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季风地带,包括东亚、南亚、东非、拉美以及地中海周围等地;灌溉农业则分布在北非及西亚的半干旱地区。Parviz Koohafkan 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细分为7大系统:1. 水稻与复杂农业生态系统构成的梯田系统;2. 以玉米和块根作物为基础的农业生态系统;3. 以芋头为基础的系统;4. 特殊的旱地系统(包括放牧系统);5. 独特的灌溉和水土管理系统;6. 复杂的多层次庭院系统;7. 狩猎-采集系统<sup>[28]</sup>。除了中国的4个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之外,其他保护试点分别为“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阿尔及利亚)、“智鲁岛屿农业系统”(智利)、“马赛游牧系统”(肯尼亚、坦桑尼亚)、“安第斯山高原农业系统”(秘鲁)、“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菲律宾)、“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坦桑尼亚)、“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突尼斯)、“佐渡沿海乡村景观系统”(日本)、“能登山地乡村景观系统”(日本)、“克什米尔藏红花系统”(印度)以及“阿特拉斯山脉绿洲农业系统”(摩洛哥)。这些农业系统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延续了约4000年,“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和“佐渡沿海乡村景观系统”延续了2000年,“能登山地乡村景观系统”和“马赛游牧系统”也分别有着1300和1000多年的历史。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开展以来,这些作为世界农业文化源头的遗产地都在积极开展着研究、传承与保护的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2011年6月9日,以“农业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主题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美、意等17个国家的120余名决策者和科学家交流了关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与经验,并向全球发布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宣言》<sup>[29]</sup>。

#### (一) 传统农业系统的文化表征

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地,分布着非常丰富的动植物物种,如东非的牲畜、香蕉、咖啡;北非的棕榈树、椰枣、豆类;南美洲西部的马铃薯、玉米、驼羊;亚洲东部的水稻、珍惜鸟类以及高原的藏红花等等。以作物为中心,这些古老的农业区域都发展出了各自独特的农业系统并传承至今。在绿洲农业区,为了应对缺少水源和土壤的生境,传统的灌溉结构、水土资源管理方法、节水知识、坎儿井等农业技术,使沙漠中央的绿洲农业成为可能。这些农业系统的物质循环自成体系,是宏观生态系统的微缩模型。南美的农业区域完好地保存了筛选、驯化动物的经验以及未经杂交、适应性极强的原生种子。拥有发达畜牧业的热带草原地区保存了传统的畜牧系统,不仅仍在应用当地的乡规民约和传统组织来管理自然资源、牲畜移动和日常生活,还能依仗牧草种类的多样性,通过牲畜与野生动物分食不同种类牧草的方式,与外部生态系统和谐相处。在季风区,稻作梯田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土地管理方式,它能够很好地保持水土。同时,季风区存在着大量林业、牧业、种植

业、养殖业多种农业生产复合的情况,并具有实施小规模农田耕作,自给自足的特点。当地人通过轮歇制度、习俗礼仪以及对土地的重视,有序地顺应了自然的声息韵律,进行着复杂的农业生产。在这些种植业发达、粮食产量大的地方,一般村落密集,人口众多,所以在水资源的分配上也有着独特的制度。例如:日本能登半岛里山-里海地区,每个村都有自己的供水池塘,村落之间不会由此发生纠纷,同时村落的节日又能将整个地区联系起来。

## (二) 农业文化系统传承的困境

作为世界遗产,这些古老的农业文明在遭遇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系统被破坏的危险,与之相应的社会文化也深陷传承危机。这些困境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第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系统自然环境恶化。如“马赛游牧系统”的干旱周期从15至20年缩短到3至5年,“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克什米尔藏红花系统”这些半干旱地区的农业系统,也因气候的变化致使固有的生态系统难以维系。第二,农业文化遗产受到周边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由于其周边的加法萨市对于饮用水需求的增加,使得加法萨绿洲灌溉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同时,外来的工业品和旅游人群带来了系统内部难以消化的垃圾。第三,农业文化遗产地面临着和其他农业地区相同的贫困问题,而由于农业文化遗产地处于现代化最为边缘的地方,其所面临的贫困问题尤为严重。第四,全球经济的波动给这些农业文化遗产系统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农林复合系统”过去一直作为咖啡种植园,依附于发达国家,没有制定过综合的发展战略。“克什米尔藏红花系统”也同样对国外的采购有很大程度的依赖,经常受到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们为生计挣扎,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受到威胁。“能登山地乡村景观系统”则因为属于发达国家日本,接受着城市化的席卷,人口向城市流动与老龄化一起造成了该地区严重的人力资源缺乏,导致土地荒芜,农业文化遗产后继无人。除了这几个主要问题,少数农业文化遗产地还面临着难以被主流的发展思潮所理解认同、缺乏保护资金等困境。这些问题都表明,农业文化遗产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系统,它们始终属于全球生态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这些问题能否在农业文化遗产的试点中得到重视和改善,关系到世界农业的命运。

## (三)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模式

农业文化遗产地无法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运作,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地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亟需破译的世界性难题。因此,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并不能仅仅凭借项目区或者当地政府的努力,而是需要建立多方合作的保护模式才能实现。目前,从各国政府到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院所以及社区组织、各类农民协会、社区居民都已经积极参与到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项目和行动中来。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有过接受发展援助经验的社区都积极开展了参与式的调查活动,并且加强了对妇女劳动的重视。这表明国际发展援助的部分理念已经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所采纳并加以应用。

各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都在进行积极的恢复性的保护工作。例如“伊富高稻作梯田系统”和“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对灌溉系统进行了修缮,“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启动了垃圾有机化处理项目,“基哈巴农林复合系统”引进了香草和玉米等作物替代单一的咖啡种植,“阿特拉斯山绿洲农业系统”采用了新的节水科技更好地利用水源。与恢复性的保护进程同时,各遗产地采取建立农产品品牌和发展旅游业两种方式,实现了当地的经济。例如“佐渡沿海乡村景观系统”为其区域内生产的产品制定了商标;建设国家公园的“马赛游牧系统”和“阿特拉斯山绿洲农业系统”成为了重要的旅游资源。在保护实践中,有些遗产地保留了传统的社区组织,另一些则成立了新的协会与管理组织。例如“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的“坑洼协会”和“马赛游牧系统”的“手工艺合作社”。“能登山地乡村景观系统”、“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还组织了外来志愿者培训,支援遗产地的保护和发展。

这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保护实践,普遍将解决当地农民的生计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规划者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农业社区的存续。然而,这种引进新物种、新技术、新组织形态的发展方式是否会破坏原有的生态系统,是否符合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宗旨,这些问题都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

#### 四、传统农业知识的发掘与乡村社会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有一个重要的目标指向,就是促进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对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和管理经验的认识,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推动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挖掘传统农业的“秘密”,解读农业生态系统的文化密码,也便成为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 (一) 乡土知识遭遇现代文明

从世界上的大江大河的流向来看,尼罗河、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南美秘鲁一带的河流都是从南向北,但中国的黄河、长江则是从西向东的。农业品种对温度、气候的敏感,决定了东西走向可以传播而南北则走不通<sup>[30]</sup>。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久远,得益于这种地理上的江河格局以及积聚了数千年的农耕智慧。就观念层面而言,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五行相生相克的辩证认识,深度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从经验层面而论,不同季节作物种植的安排、有机肥料的使用方法、各种旱作技术、稻田生产技术、选种和积肥技术等,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科学道理。骆世明从景观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三个层次,探讨了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以物种多样性为例,他将利用方法分成三类:其一是群落立体模式,利用不同农业物种之间物理和营养差异进行的。比如:南方的橡胶和茶树交叉间作,北方的泡桐和粮食间作;南方鱼塘中不同鱼种立体混养模式;云南病虫害防治模式,玉米间作马铃薯,可以有效地防治玉米大小斑病和马铃薯晚疫病。其二是食物链模式,利用物种之间的吃与被吃的关系进行。比如:利用赤眼蜂控制水稻三化螟;用平腹小蜂防治荔枝园的椿象;稻田养鱼,鱼撞击稻禾,50%的稻飞虱掉下来被鱼吃掉,鱼身上分泌的黏滑物质还可以控制水稻的纹枯病。其三是相生相克的害虫防治模式,利用生物之间的化学关系进行。比如:北方棉田间作玉米,玉米可以吸引棉铃虫的天敌瓢虫、蜘蛛等,从而有效地减少棉花遭受危害。由此可见,利用生物多样性可以不用化肥农药实现田间病虫害的控制<sup>[31]</sup>。除了这些农耕技术的传统知识外,民族传统文化和乡土知识的开掘与应用,是决定当地生活环境变迁的主要因素,对于森林保护和农业的永续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对山林的祭祀,还是农事节日的庆典,无论是传统的农耕礼俗,还是乡规民约,都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资源<sup>[32]</sup>。然而,不幸的是,传统农业这类混合种植的用地制度和生物养地的本土化习俗,在与现代高科技遭遇之时,往往备受冷遇。在西方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胁迫之下,乡村传统的知识系统以及与此相连的社群生活日趋瓦解,乡村发展陷入窘境。

##### (二)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处境

不可逆转的现代化不仅导致了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自然生态的问题,更为严峻的是,依附于村落多样化的乡村社会生态日趋瓦解。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资料<sup>[33]</sup>,从1978年至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7.9%上升至47%,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3%。与此相应的是村庄的撤并归,全国的行政村已经由90多万个锐减至60多万个,远远超出了农村人口转移的幅度。在这种凯歌高奏的现代化背景之下,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便自然地演变成为乡村发展的主旋律,“三农”的非农化似乎就是乡村未来唯一锁定的目标。这种发展观的直接后果就是对传统农业知识的无视,对村落价值认识的无知。“原农耕文明几乎一次性地被现代化转型扫地

出门,那种洋洋得意、气势汹汹,恨不得一夜之间祖国山河现代化完成的发高烧情境,比起文革时期的流氓无产者胡作非为的摧毁力大出许多倍。以牺牲传统的农业文化遗产为代价在所不惜。等到退了高烧之后,才有人发现许许多多优秀遗产已经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只留下一些残缺的文化记忆,令人们扼腕叹息,甚至后悔莫及。”<sup>[34]</sup>这种对传统的横加遗弃,无疑会使现代农业成为无源之水,最终使乡村生活在人为制造的蓝图中彻底消失。

乡村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但从事农业的人数在锐减,乡土知识的传承后继乏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278万人,他们告别乡土的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即使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地,农民离村的趋势依旧蔓延。在侨乡青田,中青年劳动力60%以上已经转移到国外和国内的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在从江小黄村,93%的农户在稻田养鱼的同时还要外出打工,主要依赖稻田养鱼的家庭不到调查农户的6%;在哈尼村寨,掌握梯田农耕技术的老者不断去世,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青一代外出打工,本民族传统文化渐已遗失;在万年,因贡谷的产量低,老百姓的收益低,种植面积在减少,保护区内的野生稻濒危<sup>[35]</sup>。中国乡村面临的发展困境,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共相。例如:伊富高水稻梯田是菲律宾首个列入有机进化类世界遗产名录的景观,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试点,这里的发展同样令人堪忧。根据本地学者的研究,这里一多半伊富高族居住在伊富高省外,外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接受了正规教育,这使伊富高人拥有了比生活在山区艰苦环境里更好的选择。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间,受过教育的伊富高人大批走出伊富高,尽管梯田已经变成一种民族身份的象征,但照料梯田的要么是雇来在伊富高干活的亲戚,要么是除了耕地种田没有其他生计的人。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农业规划和外来项目的干预,使有些原本在当地农业周期中必不可少的本地物种消失,致使当地的作物种植习惯以及相关的礼俗随之消失。梯田景观拉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代价却是当地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被破坏殆尽<sup>[36]</sup>。这种发展干预的后果,也许就是传统农业命定的结局。如何破解这些发展的难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否可以拯救濒于崩解的乡村?

作为首批 GIAHS 保护试点之一的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在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不仅改善了当地环境,维护了乡村景观,传承了农业文化,也提高了公众对农业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农民的增收和农业的增效。目前,稻田养鱼面积5300hm<sup>2</sup>,实现了亩产水稻500kg、鱼50kg,每公顷收入45000元。全县建立田鱼合作社相关企业8家,形成了从育苗繁育、活鱼销售、鱼干加工到渔家乐观光的产业链<sup>[37]</sup>。青田县的保护实践对于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以及国际可持续农业运动,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借鉴意义。如果我们能在克服现代化发展痼疾的前提下,把“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发展理念应用于农业和农村建设,那将是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世界农业的贡献。

## 五、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与启蒙

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计划,其动因之一是反思现代农业的危机与弊端,意欲在传统农业系统中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之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对世界各民族传统农耕智慧的刻意存留,更是对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哲学考量,其深层的价值则是对现代农业的反思和超越,是对“后现代农业”思想的启蒙。

农业工业化的过程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的严重威胁已不彰自显:美国1903年调查的蔬菜品种,1983年消失了90%以上;由于水稻现代品种的推广,斯里兰卡已由1959年的2000个品种降至100个左右;更为极端的是,现在所有南美洲的咖啡几乎都来自荷兰植物园里的一株咖啡树;19世纪以来,大概414个家畜品种濒危,617个消失。20世纪初大概3831个牛、羊、马、驴的品种已经有

16% 消失, 15% 变得极为稀少<sup>[38]</sup>。与此同时, 现代化知识系统也已改变了乡土社会的格局: 高科技农业增加了粮食生产, 但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逐离土地, 或把他们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农工企业集团的附属物, 其结果是乡村生活的终结。当农村迎来各式农业专家之日, 当农村旧有的社区组织解体之时, 农业便由一种生活方式约化为一种生存手段, 农民也就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翁<sup>[39]</sup>。那么, 农业的前景何在? 前现代的生态理念与传承于民间的乡土知识能否化解乡土的危机?

中国传统农业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理念和方法, 这是维系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基本要素。中国的耕地资源只占世界的 7%, 水资源占世界的 6.4%, 而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 10%。在这样生存资源极度缺乏的自然条件下, 我们的农业却养活了世界 1/4 的人口。究其根本, “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 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 不少土地越种越肥, 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传统农业所创造的。”<sup>[40]</sup> 而工业文明的导入, 使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随着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的进入, 土地在短短的 30 多年间就已经出现了硬化、板结、地力下降、酸碱度失衡、有毒物质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当然, 这样言说并非是盲目地拒绝工业文明和掩饰传统农业的局限。如何将二者有机整合, 正是后现代农业努力探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柯布( John B. Cobb) 认为, “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与自然相疏离的结果。在回归合乎生态的世界观念与实践方式等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能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启发。但令人悲哀的是, 对现代工业化西方的大规模模仿, 使中国处于摧毁这种可能性的危险之中<sup>[41]</sup>。在这种危机高悬的情境之下, 与其说我们在保护传统农业的经验与技术, 不如说我们是在呵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存理念。”

农业生产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的资本。从生活的角度来观察农业生产行为, 可以称之为“农活”。在这一过程中, 有人与动植物之间的情感交流, 有创造性劳作中对生活真谛的体悟。因此, 农业劳动充满了一种“综合的人性”, 其独特的教育作用有助于对“完整的人”的设计与培养<sup>[42]</sup>。遗憾的是, 这种“农活”在人们的观念中已渐行渐远, 城市文化正在影响着农民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原初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 工业与城市夺走了农业与农村的活力, 也在不断地重构着乡村的生活节奏与内容。那么, 乡土记忆是否会永久地成为过去,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否会为阻止农耕民族的“集体失忆”带来一线生机? 人类学家玛丽·鲁埃( Marie Roue) 对詹姆斯湾的克里印第安人的研究, 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我们所关注的传统农业的意义与乡土文化的价值。由于原住民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年轻人非但在学校一败涂地, 而且也没有能力获得打猎、捕鱼、设陷阱之类的知识和技能。双重的失败把他们推到了绝望和暴力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 某些在狩猎营地继续其传统活动的长辈, 将失足的青少年接到营地, 引导他们“重归土地”开始新生, 从而成功地重建了他们与世界的关系<sup>[43]</sup>。这个经典案例至少带给我们两点启示: 其一,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对现代农业后果的生态补救, 是对“乡土中国”世代传承之生活方式的重建与回归; 其二, 遗产地的保护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 传统知识均镶嵌于民众生活之中, 因此整体保护传统农业的文化与社会系统, 并非是浪漫的怀旧, 而是恢复乡村活力、增进农民选择生活能力的重要策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让我们回到前现代的农业社会, 而是立足于当下重新思考农业的发展和乡村的未来。作为一种“情感的学问和实践”,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目的是能形成一种精神动力, 让我们的子孙在祖荫下更好地生存与生活。如果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 我们丧失了对这些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传承能力, 失去的不仅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质, 更是基于历史认同的安顿心灵之所。就此而言, 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面上是保存传统农业的智慧, 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乡土文明, 其更为长远的意义则在于留住现在与过往生活之间的联系, 留住那些与农业生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集体记忆。

## [参考文献]

- [1] 闵庆文. 关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文名称及其他. 古今农业 2007(3):116-120
- [2] 闵庆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及其在中国的执行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二).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77-80
- [3] 王思明 等. 中国的农业遗产研究: 进展与变化. 中国农史 2010(1):3-11
- [4] 闵庆文 等.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 资源科学 2011(6):1018-1024
- [5] 苑利 等. 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126-133
- [6] 鲁奇. 中国传统农业一些重要观念的再发现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75-82
- [7] 高志 等. 稻鱼共生系统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中的作用. 安徽农学通报 2010(9):162-164
- [8] 闵庆文 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新机遇. 世界环境 2008(1):62-64
- [9] 李文华 等. 用生态价值观权衡传统农业与常规农业的效益——以稻鱼共作模式为例. 资源科学 2009(6):899-904
- [10] 焦雯璐 等. 基于生态足迹的传统农业地区生态承载力分析——以浙江青田县为例. 资源科学 2009(1):63-68
- [11] 焦雯璐 等. 基于生态足迹的传统农业地区可持续发展评价——以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 2009(1):354-358
- [12] 张丹 等. 传统农业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以贵州从江县为例. 资源科学 2009(1):31-37
- [13] 张丹 等. 稻鱼共生系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比较——以浙江省青田县和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6):30-36
- [14] 章家恩 等. 鸭稻共作对土壤微生物数量及其功能多样性的影响. 资源科学 2009(1):56-62
- [15] 章家恩 等. 鸭稻共作对水稻植株生长性状及产量性状的影响. 资源科学 2011(6):1053-1059
- [16] 张丹 等. 不同稻作方式对稻田杂草群落的影响. 应用生态学报 2010(6):1603-1608
- [17] 闵庆文 等. 侗族禁忌文化的生态学解读——以黔东南侗族为例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60-74
- [18] 刘珊 等. 清代黔东南地区森林资源变化及其社会区域响应的初步研究. 资源科学 2010(6):1065-1071
- [19] 张凯 等. 传统侗族村落的农业文化涵义与保护策略. 资源科学 2011(6):1038-1045
- [20] 玛丽·鲁埃. 引言: 文化与自然之间.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7(1):10
- [21] 吕耀. 中国农业社会功能的演变及其解析. 资源科学 2009(6):950-955
- [22] 刘朋飞 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关系研究. 古今农业 2008(4):89-98
- [23] 何露 等. 农业多功能性多维评价模型及其应用研究——以浙江省青田县为例. 资源科学 2010(6):1065-1071
- [24] 闵庆文 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建立多方参与机制. 古今农业 2006(3):116-119
- [25] 袁俊 等. 生态旅游: 农业文化遗产地保护与开发的制衡——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 乡镇经济 2008(2):74-77
- [26] 闵庆文 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 经济地理 2007(5):856-859
- [27] 郑召霞 等.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有机农业发展的研究——以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为例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272-283
- [28] Parviz Koohafkan.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管理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探索.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98-100
- [29]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二).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141-349
- [30] 骆世明. 挖掘传统农业的“秘密”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二).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 469

- [31] 骆世明.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268 - 270
- [32] 孙庆忠. 乡土社会转型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中州学刊, 2009(6): 109 - 113
-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2 - 02 - 22]. [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120222_402786440.htm)
- [34] 乌丙安, 孙庆忠. 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 36
- [35]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59, 69, 78, 82
- [36] 拉舍尔·圭姆巴坦, 泰迪·小巴圭拉特. 对保护菲律宾水稻梯田文化景观这一提法的误解.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7(1): 63 - 72
- [37] 闵庆文, 等.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实践的主要进展. 资源科学, 2011(6): 1018 - 1024
- [38] 骆世明. 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 // 闵庆文, 主编. 农业文化遗产及其动态保护前沿话题.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0: 266 - 267
- [39] 马格林. 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 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 // 许宝强, 汪晖, 选编. 发展的幻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325
- [40] 王治河. 关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后现代哲学考量. 哲学动态, 2010(4): 5 - 14
- [41] 小约翰·柯布. 文明与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6): 18 - 22
- [42] 祖田修. 农学原论. 张玉林,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150 - 155
- [43] 玛丽·鲁埃. 依靠回归土地医治教育的创伤: 老一辈克里人拯救迷失的一代.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7(1): 17 - 26

## Agro-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and Conservation Practices in China: Progresses and Perspectives

Sun Qingzhong Guan Yao

**Abstract**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is a program launc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in 2002, which aims to promote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asants' livelihoods on the premise of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preserv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s of GIAHS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moting process and research status of conservation pilot systems. The paper also reite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 reflection on the crisis of high-tech agriculture, the preservation of Agro-cultural heritage is not only a deliberate preser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rming wisdom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a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whose deeper value is a transcendence beyond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modernity, and enlightenment on the "Post-modern Agriculture".

**Key words** 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system; Local knowledge; Rura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常 英)